

卿云楼外的传说

读史老张

在复旦大学校园（邯郸路校区）东南角，有一幢老房子，名叫“卿云楼”。卿云楼名，源于“卿云烂兮，烂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诗句，名字古雅，样貌却很平常。乍一看，还以为它是老工房，火柴盒式样，五层楼，格子窗，灰墙。无论是年代、颜值还是名气，卿云楼都难以与奕学堂、子彬院和相辉堂等老建筑匹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里程碑式的地位：复旦第一幢留学生楼。

复旦正式招收留学生，是在1949年以后。最早的留学生，来自日本，名叫今富正巳。今富正巳于1952年从私立上海学院转入复旦中文系，师从过贾植芳先生。1953年夏，今富正巳提前毕业，贾植芳将自己的散文集《热力》赠予他留念。1955年后，贾植芳因“胡风案”蒙难，复出后遍寻《热力》未果。没想到，到了1983年7月，他忽然收到日本寄来的复印件，寄件人今富正巳，此时已是东洋大学教授。贾先生说：“打开一看，正是《热力》，是我当时送给他的那本，扉页上还有我的题辞，不过今富先生在前边又加了一句：‘时隔三十年’！”（贾植芳《狱里狱外》）

今富正巳之后，又来过三位日本留学生：中田庆雄、山下好之和菊地升。1956年9月，他们进入中文系，跟随胡裕树先生，学习现代汉语。据中田庆雄回忆：“我从未缺席过胡裕树先生的讲课，而且还直接在教研室接受他的辅导。他还给我指定阅读的参考文献，平均每三天为我上一次课，还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中田庆雄《冰花》）中田庆雄毕业后，长期从事中日友好事业，曾任职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他还多次回访复旦，并被聘为复旦顾问教授。

我一直有个疑问，上述日本留学生入学时，复旦还没有留学生楼，他们住在哪里呢？得知1957年入读中文系的陈光磊先生曾和他们一道听过课，我去向他请教。陈光磊说：“我们中文系男生当年住在学生宿舍6号楼；日本留学生住在哪里，我倒不清楚。反正是在6号楼里，我没见过他们。”我又到复旦档案馆查找史料，没有日本留学生的住宿记录，却在今富正巳的学生登记表上，发现了他的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溧阳路853弄167号楼下”。

1959年，复旦来了一位苏联留学生，名气最响。他叫米沙，全名米哈依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季塔连科出生于1934年，1953年入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曾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早在入读时，季塔连科偶然读到郭沫若《十批判书》俄译本，便着了迷。他提笔就给郭老写信，表示对中国哲学的强烈兴趣。两个月后，他收到了郭老的亲笔回信：“亲爱的苏联朋友，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如果你真的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真心想深入研究，作为长者我要告诉你，你需要掌握汉语，但不仅仅是现代汉语，还要学习中国的文言文。”就这样，1957年2月，季塔连科赴华留学。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业于任继愈、冯友兰先生。1959年9月，转到复旦哲学系，师从胡曲园、严北溟等先生。

那时，中苏关系尚在蜜月期。学校对季塔连科很重视，专门拨出一套住

房，作为他的“留学生宿舍”——在复旦历史上，这是个特例。季塔连科后来称：“复旦的条件很好，我被安排在一个有四个榻榻米的日式小房子里……”这个“日式小房子”，位于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27号，原为卢鹤绂先生寓所，卢家迁往第九宿舍后，这里就成了季塔连科的家。据复旦子弟李北宏先生回忆，他曾去过27号，“走进他家，第一感觉是屋子里陈设简单，不过出奇的干净。一幅列宁的画像挂在朝南的前屋，他的太太正在熨烫衣服。”（李北宏《回忆复旦季塔连科》）季塔连科的太太娜嘉，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留学。他们一家，在徐汇村一住就是两年。

当年在复旦，少有外国人。季塔连科高眉深目、身材颀长，在校园里非常显眼，几乎人人都叫他“米沙”。他记得：“在毕业典礼上，校长陈望道教授宣布：‘1号毕业证书将颁发给一名外国留学生、一位苏联公民——米沙同志。’他们误把我的名字当成了姓。大会结束后我不得不作出解释，因为这样的证书对我是无效的。一周后，系主任胡曲园给我补发了姓为‘季塔连科’的毕业证。”（季塔连科、维诺格拉多夫《一生为中国而战》）

复旦有临时留学生宿舍，是在1965年。那年9月，根据外交安排，复旦首次接收越南留学生，共计214名。学校腾出原学生宿舍4号楼，让越南留学生入住。4号楼位于校园东侧，靠近国定路，环境幽静，住宿条件也最好。秦湘老曾担任过留学生的班主任，她告诉我：“4号楼每个房间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越南留学生的待遇，比中国学生好多了！他们的日常开销，都由我们承担。那时，孙保太先生任校办副主任，负责留学生管理，他工作非常细致、认真，大到服装定制，小到杯子式样，都要一一过问。”复旦4号楼，见证了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抗美援朝的真情。

一年以后，“文革”爆发，越南留学生陆续归国。临别时，他们抱头痛哭，依依不舍。不久前，孙晓刚校友赠我一册越南留学生影集，说是他父亲孙保太收到的留学生礼物。翻开扉页，黑卡纸上粘贴着一行金色的中文字：“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一看就知道，那是越南留学生回国前，费时费力精心制作的。

越南留学生走后，4号楼回归为普通学生宿舍。1974年，复旦恢复招收留学生，至1978年，已达近40名。这些留学生，大多由西方国家公派。他们与中国学生一起，合住在4号楼。其中，有一位英国留学生，名叫迈克尔·兰克，中文名为阮迈可，他由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派遣，于1975年到复旦研修汉语。留学期间，阮迈可酷爱研究上海老地图、老地名。他带着相机走出校园，用那时还罕见的彩色胶卷捕捉上海瞬间：邯郸路上的有轨电车、福州路上的三山会馆、南京路上的样板戏电影宣传牌和黄浦江上的老帆船……这些风景，今天早已绝迹，却是上海城市变迁的写照。2005年，阮迈可将它们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曾引起轰动。

阮迈可在复旦留学时，就住在4号楼，他曾晒过一张宿舍照片：一只木质书架，书架上挂着热水袋，放着白色搪瓷茶缸；两张木质单人床，床上铺着草席，放着纸板箱；白色的墙上，钉着一幅有些年份的列宁画像……看得出，当

年4号楼已经老旧，阮迈可们的留学生活，谈不上舒适，甚至有点寒酸。

1978年初，复旦决定投资33万元，建造一幢独立的留学生楼。1979年，留学生楼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卿云楼。该楼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有90余间房。每间寝室14平方米，可供两位学生居住。那时，我住在学生宿舍6号楼，七人一间房，没有空调，也没热水，每层楼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而留学生楼环境幽雅，设备高档，不仅有阅览室、文娱室、厨房、餐厅和浴室，单是24小时热水供应，就让人欣羡不已。记得我第一次去留学生楼，那黄色灯光、红色地毯、栗色书架，让我有点迷幻，仿佛置身于高级宾馆。1981年世界杯男排赛期间，我“蹭”在留学生楼里，看过一场电视实况转播。那一次，主攻手汪嘉伟受伤，戴廷斌麾下的中国男排意外输球，大家一片叹息。只有我，好像并不沮丧，因为“享受”了大彩电，反倒有某种心理补偿。

留学生楼建起后，学校画风渐变。本来，男生一律蓝灰色服装，松松垮垮；女生也不事妆容，素面朝天，色彩有点沉闷。有了留学生楼，校园东南角的风光，忽然明丽起来。那些留学生们，有穿牛仔短裤和拖鞋的，有穿大格子花衬衫的，还有衣着暴露、曲线尽显的……他们出没在留学生楼外，面容阳光，个性奔放。我曾亲眼见过一名女留学生，抹着深红色口红，扎着一缕红头绳，袅袅婷婷，行走在“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她耳垂坠着的金属耳环，随着摇曳的身姿荡

笔会

江南无闲时

（铸铜）

潘锡柔

上海临港新片区滴水湖中国名家主题雕塑公园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漾，叮铃当啷，就像风铃一样，攒足了校园回头率。

留学生楼一侧，有个大草坪。课余，留学生们喜欢躺在草坪上，敞开心扉的男生喝啤酒、穿得很少的女生晒太阳，全然不顾“有碍观瞻”。草坪对面是个理发店，据说常有中国学生跑到店里，东张西望。那时，不少人思想还有点保守，对此议论纷纷。事情反映到校长办公室，据时任校办主任的王邦佐先生回忆：“我就跟谢希德校长汇报，说影响很不好，建议不要再让留学生去那里晒太阳了。我以为她会支持我，结果没想到她说这有什么，国外这样的人多得很啊，她们喜欢晒太阳，就晒吧。”过了一些日子，留学生楼另一侧多了一排躺椅，留学生们都去那里晒太阳了。“那边是留学生楼，我们的学生过不去，也看不着了。”（王邦佐《“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谢希德校长处理问题，既灵活又兼顾各方感受，令王邦佐真心折服。后来王邦佐到上海师大担任副校长、校长，一直铭记着谢校长的叮嘱：“实事求是，留有余地。”

1984年后，政通路上建起了几幢新的留学生楼，留学生们陆续迁往新楼。后来，原留学生楼改名为“卿云楼”，另作他用，淡出了人们视野。有一阵子，政通路被誉为“老外滩”，名扬校外；退隐的卿云楼却长期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前几天，我又特地去了校园东南角，但见卿云楼外，一片清冷……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里曾经色彩最艳丽、风景最迷人？

写于2021年10月，复旦燕园



收割

唐池子

摇下车窗，远眺一辆红边的收割机，像一叶舟在稻浪中摇曳。那是日落时分，暮色徐徐，降落在一片平川上的金色稻田上，临近是陡山湖边上一个叫六如墩的自然村落。那片稻田自然是住在那些黛瓦白墙乡间别墅的农人所作，窗含千里金浪，门前万里稻香，想来很是壮观。但我更好奇那台红边收割机。因为还没见过收割机现场收割，索性决定改道拐进墩里的村路。

夜色苍茫铺在金黄的稻田上，举着饱满颗粒的稻子，一整片一整片垂头静默着。除了十月的晚风，那辆红边收割机是唯一行动者，走近才发现它其实似巨轮，在广阔稻浪中间前行。空气中多种气息混合，机油燃烧的气味，泥土味，稻草浆汁味，刚打下的新稻香，一齐裹挟着，随着收割机这个庞然大物扑面而来。发出巨响的发动机卖力工作着，它的声势暴露了它的功率，咔咔咔咔，像多支部队拉练挂挡的阵势。

这阵势让人感觉眼前的收割机更加巨大。它的车辙也真大，每次移动都会在新翻的禾茬和泥土上留下崭新的深深的印痕，让人想到装甲车般的笨重结实。

我看着它来回碾过一次，看着它像巨兽般眨眼看吞掉面前的稻谷，咔咔，一顿疯狂的咬噬，其实应该是内部锋利刀刀在迅速切割，于是，刚卷进去的弹性十足的稻秆，出来时已经被粉碎成蓬蓬的一团飞屑，从收割机后面吐出来，刚刚收割完水稻的土地上，留下一堆堆长短参差的屑堆。而沉甸甸的稻谷应该同时被卷进前面的大仓斗里，那里像一个真正收获的秋天。

收割机有人在驾驶，高台一样的驾驶室里是一个着旧衣的男人。看不清样貌，神情却像英雄，高高站立，娴熟地操纵着方向。

发动机声响不小，想来高处的他既吹不到此刻清凉柔细的芙蓉风，也听不见湖荡中白鱼跳跃落水的声响，还有白鹭灰鹭敛翼回巢的动静。这个全神贯注的男人，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我停车静静伫立，已经看他半晌。

这时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吧，暮色像生出了漆色的翅膀，这种时分的收割，怕怕咔咔地巨响，也有一种静涛般的画面感。

此时此刻，略感晚风寒意的我抱臂而立，风在吹，稻屑在飞扬，稻谷在收仓，我们不过是背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着旧衣裳的男人，站在高高的收割机上，独自收获一马平川的深秋。

他也许想趁着最后一点光亮，割完至少这一茬的水稻吧。独自工作着的他，在这暮色四合之地，哪里能像将军那样，向着谁高声地开心地唤：“小山，毛毛，加油啊！”

不知为什么，潮水一样的雾露打在眼角，眼前六如墩的红边收割机被多年前那台备受我们宠爱的脚踩打稻机覆盖了……

我的老家在长沙的乡下，在我小时候我们收割稻子没有收割机，每年双抢收割稻子都是乡村一年中最辛劳的时光。割稻子和收稻子是两道程序。先割稻子，一把薄片的银镰子装在木手柄上，我们手小，大人的镰柄抓不牢，手还容易被银镰子割破，掌心也可能磨出一串蚕豆大的水泡，疼死人。好在父亲什么都会，为我们刨出迷人的杉木手柄，又小又轻，好像吴钩弯月。

噢噢，割稻子大快来了。左手抓一束稻秆，右手握银镰子割下，杀杀杀，割下的水稻一摆一摆等距离放置身后，排成平齐的一行。有时停下拭汗，转身回望自己身后黄金成堆，也有种怦然心动的欣喜。稻田里当然不会只有稻子，蚱蜢、蟋蟀、癞蛤蟆、纺织娘、水蜘蛛……有时还有那种皮肤水晶透明的四脚蛇——好家伙，因为你割了它们藏身的“森林”，它们懒得一动不动，呆呆抬头看你。蠢萌的家伙，你得挥着银镰子吓唬，它们才恋恋不舍地逃走。哈，都不知道谁怕谁！还有秆叶谷粒碰撞的沙沙沙，稻秆被银镰子切断的咔嚓，那迟迟不落的贴在天边的毛边红月亮，哦哦，所有这些都回来了，一起声色丰富，响在耳畔。

割了稻子，然后打稻子。那台著名的打稻机，香樟木的，滚了桐油，是父亲亲手做的，因为小巧省力，一直是老家花湾的宠物。我家打完，流水席一样家家户户轮着借走，父亲总是乐呵呵与邻人分享自己的创造。

父亲和那台打稻机成了世界的中心。父亲不到一米七的个子，身材结实，身手矫健，他的右脚踏在打稻机的踩杆上，踩下去松起来，身体也一上一下顺着节奏起伏着，我和弟弟同时给他一个人“喂禾”。“喂禾”就是把割下的“稻穗”抱给他，像接力赛一样，他接过，把稻秆前端的稻穗放在滚动的滚轮上，立即传来噼里啪啦的撞击声，那是脱下来的稻粒飞速撞在稻桶上的声音，像在下一场好大的金谷子暴雨。真好啊！真好啊！仿佛打稻机在喝彩在高赞。

光脊背的父亲，每块结实的肌肉都紧绷，肌肤晒成古铜色，满背汗水如泉涌。头上、脸上沾着弹射出来的金色谷粒，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带芒的力神。

我的父亲啊，他那双有劲的脚板，像踩着天地的春雷，像踩着秋天的脊梁，像踩着我们一家人的希望。他哈哈笑着，声音洪亮，大声喊：“小山，毛毛，快喂我啊！加油，加油，我好饿啊，好饿啊！”他幽默呼唤的声音，伴着有力的踩踏的节奏，像伴着鼓点的将军正在挥旗指挥他的天下。我和毛毛，吐着舌头来回奔跑着，一头细汗抱着沉甸甸的“禾”，飞奔去“喂”父亲和他的打稻机，让他们一刻不停地“吃个饱”。

那个时候，中国的每一粒稻子都是像父亲这样，用自己的力气踩脱下来的，每一粒稻子都沾着一家子合作劳作的汗滴。真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烈日炎炎异常艰辛劳累，却成了现在回忆的微甜珍肴。那里没有孤独困惑，有的就是一家子齐心协力围绕父亲和他的打稻机，收获亲情的糯糯以沫。

也许正是儿时经历过那些苦苦的磨砺，才会在后来人生路上遭遇坎坷困难时，不会轻言放弃轻言艰难。那位一直鞭策鼓励呼唤着我们加油啊的将军，永远勇武如力神，活在我们心中。

写他年老以后的事，他似乎预料到疾病的埋伏，预料到他的晚年会抑郁、感伤及无能为力。

我将父亲的最后一本回忆录往后翻，自我出嫁之后的记录，都是空白。忽然，我惊住了，在本子的倒数第三页上，又出现了密密的文字。父亲将自己的心事封存在这里，似乎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今天，女儿出嫁。她执意不想要婚礼，我们与亲家吃了一顿饭，婚礼就算结束了。我还用滚轮行李箱带去了那些落下的嫁妆。走的时候我拖着空箱子，攥着拳头使劲不让自己眼泪流出来。孩子的母亲一直在抹泪，与女儿嫁到万里之外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女儿潦草粉刷过的新房，离我们只有5公里，但是，市中心棚户区的新房没有独立卫浴，女儿如何洗澡？晚上是打着手电去公共厕所，还是打算一大早排队倒痰盂，都让人恶心。我没有告诉女儿的，她出嫁之前，我约见了她的未婚夫。这次谈话延续了六个小时。我把我的担心和期待都交代了。我告诉她的未婚夫，我到他的单位去考察他的背景与人品。我要求他将我们这次严肃的谈话压下来，不告诉任何人。若实在要告诉我的女儿，必须在他们结婚十年以后才能告诉。”

这页纸仿佛是父亲的树洞。我敲击键盘，录入向来软弱的父亲坚定的话语，喉头突然哽住了。

替父亲录入回忆录

明前茶

父亲73岁那年罹患血管性痴呆症，母亲日益沉浸在她逐渐失去丈夫的苦恼中。有一天，我回家，母亲找出了二三十本笔记本，说这是父亲写于50到60岁之间的回忆录。母亲跟我商量，要把父亲的回忆录整理、打印出来。她相信父亲的回忆录里有他患病与治愈的线索，而父亲写得那么零乱又琐碎，母亲心态上又烦躁，手写的文字看不下去。另外，一旦我将父亲的回忆录录入电脑，母亲就打算去买一台打印机，自行打印和装订它。“若是你爸爸有朝一日不在了，分发家里的子侄辈，对你爸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将父亲的回忆录背回家让我出了一身汗。我没有想到，十年间，父亲留下的字迹有这么沉重的分量。回忆录写在各式各样的笔记本上，硬面本，软面本，外孙女没用完的田字格本，单位印多了的工作日历本。为了顺应本子的书写规范，父亲的字迹忽大忽小，但大体上清楚，每一竖都向左侧微微飘摆，如新发的柳丝，与他谨慎、软弱、自得其乐的性格十分相称。

我没有想到，自从开始录入父亲的回忆录，我得以沉浸在父亲珍贵的壮年时光中，沉浸在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四处郊游与学习的往事中，沉浸在他没有对任何人表述过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的微微怅惘中。

那时候的父亲记忆力还很好，因此他没有急于写眼前的事，而是从我5岁那年，母亲被一纸调令调到他身边，夫妻终于结束两地分居写起。我看到父亲买下第一台海鸥相机的欣喜。那时候的两个黑白胶卷要花掉他一周的工资，但父亲依旧在春日，毫不吝惜地带我和母亲去玄武湖和白鹭洲拍照。春和景明，花红柳绿，假山亭台，古桥流水，父亲心甘情愿当母亲的御用摄影师。为了节省胶卷，父亲决定每拍20张，自己才用延迟拍摄的快门，参与合影一次；为了节省洗照片的费用，父亲在家里用黑绒布帘遮挡，自搭了一个暗房。

他那台海鸥相机，除了记录母亲风韵犹存的时光，就是忠心耿耿地记录了两个女儿的成长。在他的回忆录中，我终于找到自己是何时学会了在煤炉上扇火做饭，何时学会了写大字，承包家里的春联，何时学会了骑脚踏车，父亲在回忆录里洋洋自得地写道：“1985

年11月26日，把着书包架奔跑，勉力维持脚踏车平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大女儿学会了骑脚踏车，不会见到别人晒的煤基和棉被就惊慌失措。她自如地避让任何障碍，像鱼游在了水中。”

喜欢吃糯米食品，也是父亲留在我身上的印记。在父亲的回忆录中，我还发现，自己何时学会了做八宝饭。小时候，每逢过年，父亲都要带着我一起做八宝饭。熬炼雪白的猪油，红豆蒸烂后用饭勺压碎，和以猪油，做成油润绵密的红豆沙。准备八个大号饭碗。碗底抹上少许猪油，铺上蜜枣、去核果脯、葡萄干和枸杞，拼排出漂亮的图案。夹心八宝饭做好后，要反复上笼蒸透，直到食材浑然一体。因此，这种费柴火的节日食品，理应多做一些分送邻居。

与父亲一同端着八宝饭前往邻居家拜年的日子，是我小时候最盼望的荣耀时刻。父亲和我一样穿着崭新的衣服。邻居们会鉴赏我们的八宝饭，

并留我们喝茶。那是我小时被当作大人郑重招待的难忘时刻。奇妙的是，父亲的大衣袋里还卷插着我的作文本，在邻居家里，他总要三拐两弯，扯到我布满了红圈的作文本，并毫不脸红地拿给我传看。他以老派人的谦逊提起：孩子学习很用功，作文被别班的老师借去当范文。父亲又无担忧地说：他宁可孩子皮实又钝感，因为敏感的小孩容易受伤害。我记得，邻居们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对父亲的羡慕，就得使劲儿宽慰他了。差不多年纪的邻居，都对父亲那种“巴望孩子长大，又怕孩子长得太快”的心态感同身受。当我带着满满一袋糖果花生离开时，邻居大伯悄悄地对我说：“等你出嫁时，你爸不晓得有多少说不出的伤感呢。”

我那时还是懵懂初中生，尚不能理解那句话。父亲自信豁达，闪闪发光的盛年很快就过去了，回忆录里几乎没有